

自传体推理：自我同一性形成的思维加工*

林加彬 李力红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长春 130024)

摘要 自传体推理是将事件和自我联系起来创造连续性人生故事的推理,它是自我同一性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加工。自传体推理将自我概念和个人经历联系起来,发展和保护个人连续性及自我同一性感知。首先阐述了自传体推理的类型,分析了影响自传体推理发展的因素,归纳了自传体推理的脑神经机制的研究成果,介绍了自传体推理与心理健康及幸福感关系等方面的应用研究。最后,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总结分析,预测了自传体推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 自传体推理;叙事;人生故事;自我-事件联系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也译作“自我统合”,“自我认同”,最早由新精神分析心理学家 Erikson (1956)提出,其内涵极其丰富,既有个体对过去、现在“自己是谁”及“未来自己将会怎样”的主观体验和功能,又包括决定这种整体性体验的内在过程和心理结构等。本文采用自我同一性的译法,意在关注自我同一性的结构性特征。Berzonsky (1994)以及 Grotevant 和 Carlson (1987)的研究表明,自我同一性结构是在组织众多关于自己信念的基础上,发展出的自我整体一致性的概念框架和解释自己的原则,因而它是自我概念的高级成熟的形式,标志着自我概念的发展水平(郭金山,车文博,2004)。自我同一性是个体保持自我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关键,青少年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自我同一性的追求。若个体缺乏自我同一性则会导致心理病理学症状,尤其是某些人格障碍的症状(Weston & Heim, 2003),甚至会引发自杀的行为(Chandler, Lalonde, Sokol, & Hallett, 2003)。人们在形成对自己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连续性感知过程中,是通过叙事(narrative)即讲故事的方式将纷

繁复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经历统一起来,建构和重构着自我,发展出稳定的自我同一性(McAdams, 1993; Ricoeur, 1983; Sarbin, 1986)。在自我同一性结构的整合过程中,自传体推理是起核心作用的认知加工环节。个体正是通过自传体推理建立起故事之间以及故事与自我间的联系,形成一致性的生活故事,从而最终达成自我的同一(Pasupathi et al., 2007)。

近年来,关于自传体推理的研究在其分类、发展规律、影响因素、脑机制及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本文总结了自传体推理的基本观点,梳理了主要的实证研究内容,并提出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2 自传体推理的内涵及同一性功能

自传体推理的概念最早由 Habermas 和 Bluck (2000)提出,指个体将事件和自我联系起来,制造意义(Bluck & Glück, 2004)构建连续性人生故事的一种推理,也是个体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生活的不同方面与其人格发展间创立关系的活动(Habermas, 2010)。自我同一性是在建构一致性生活故事获得的(McAdams, 1993; Ricoeur, 1983; Sarbin, 1986),一致性生活故事的形成,又是通过自传体推理的加工建立起了故事之间以及故事与自我间的联系,使生活故事成为对个体具有统一意义的整体,从而实现自我的同一(Pasupathi et al., 2007)。

收稿日期: 2014-11-05

*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0YJAXLX009)“学龄期儿童表征认知风格结构及其发展研究”。

通讯作者: 李力红, E-mail: lilh@nenu.edu.cn

在个体的童年早期,生活故事以零碎的形式存在,自我的身份也是多样且不稳定的,进入青年晚期和成年早期,个体开始发展出从一个稳定的视角构建因果一致性和主题一致性生活故事的能力(Habermas & Bluck, 2000),正是这种能力塑造了稳定的自我。Habermas 和 Bluck (2000)认为这种能力属于社会认知能力,与皮亚杰的一般认知结构或科尔伯格道德推理结构中的基本认知能力不同,具有自身特殊的内在过程和结构。自传体推理的加工是反省性思维加工,人们在自我反思或谈论过去经历时,将繁杂的事件植入具有统一意义的结构里,形成个人生活元素和自我间的联系,把凌乱的生活事件变得有秩序,在将以往经历和自我的联系中来理解他们是谁,并且创建一致性的生活故事(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自传体推理从传记的视角见证个人生活故事在时间经历中的意义演变,缓解了由于不同情境和时间中获得的对自我彼此迥异的感知所带来的矛盾,在把各种生活事件成功的整合到生活故事的过程中,个体完成了将生活中的当前自我、过去自我、过去事件和过去情境间的联系,将自我概念和个人经历联系起来,从而赋予生活故事以统一的意义,发展和保护着个人连续性和自我同一性感知(Bluck & Alea, 2008)。

自传体推理是通过自我变化推理(self-change reasoning)和自我稳定推理(self-stability reasoning)来发展和保护自我同一性。自我变化推理承认和理解个人一生中经历的巨大变化,它避免了个体被停滞感所击垮;自我稳定推理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条件下建立对自我稳定的感知,避免个人由于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分离,而导致无用感、孤独感以及自我有害行为的出现(Dunlop & Tracy, 2013; Habermas & Köber, 2014)。

3 自传体推理的结构与分类

自传体推理的结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数量和复杂性的变化。Habermas 和 Bluck (2000)在提出自传体推理概念时就指出,自传体推理存在数量和复杂性的差异,依次从低到高将其归纳为自我-事件联系、事件-事件联系和主题一致性三种类型。

3.1 自我-事件联系

自我-事件联系指描述个人经历和自我的某

个方面(如个人特质,价值观态度和信仰)间的联系(McLean & Fournier, 2008; Pasupathi & Mansour, 2006; Pasupathi et al., 2007)。加工和建构自我-事件联系是自传体推理的最初阶段,始于青春期早期个体开始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思考自己。Pasupathi 和 Mansour (2006)把自我-事件联系看作是自我跨经历和时间整合的重要的自传体推理类型,由于自我-事件联系使个人生活事件与个人特质和能力发展间建立明确的联系,因此提供了衡量自传体推理程度的基本尺度。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将自我-事件联系做了进一步的分类。Pasupathi 和 Mansour (2006)最初认为初始编码图式有 5 种关系类型:(a)自我解释事件或事件说明自我的一个早已存在的品质,(b)事件表明自我的新的但应当被摒弃或忽视的品质,(c)事件引起自我观点的变化,(d)事件揭示了先前存在但不被认可的自我品质,(e)事件与自我没有联系。但经过研究,他们发现一些分类(摒弃或揭示)在访谈中极少出现,所以他们把这 5 个编码整合为 3 个:事件与自我没有联系、有稳定的联系(事件解释说明自我)以及变化的联系(事件改变自我)(Pasupathi & Mansour, 2006; Krettenauer & Mosleh, 2013)。

Pasupathi 和 Weeks (2010)继自我-事件联系分类进行了延续性研究,以一种更详尽的方式看待自我-事件联系类型,他们识别了一些独特的自我-事件联系类型,这些类型可能是人们在讲述日常人生故事的背景下建立的。Pasupathi 从自我-事件联系的稳定程度将这些自我-事件联系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含维持稳定性的联系,另一种是包含发生变化的联系。稳定的和引起变化的联系都通过联系过去、现在和个人主观能动的将来创造自我一致性。维持稳定的联系包含解释性联系(Explanatory)、说明性联系(Illustrative)和摒弃(Dismissal),引起变化的联系包括因果联系(Causal)、揭示联系(Revealing)、未知结果的挑战(Unclear effect challenge)和并列联系(Juxtaposition)(详见表 1)。

Habermas 和 de Silveira (2008)发现维持稳定的自我-事件联系出现得更早,并且比那些维持变化的联系更普遍;说明维持稳定的自我-事件联系可能比那些引起变化的自我-事件联系更早地对个体起作用。

表 1 自我-事件联系

自我-事件联系	简单定义和举例说明
维持稳定的联系	
解释性联系(Explanatory)	自我解释事件为什么发生的方面 “因为我是个不错厨师，所有他邀请我帮忙做菜”
说明性联系(Illustrative)	事件说明自我的方面 “我很外向——有时过于外向，例如，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直接就走到一群人中，并加入他们的讨论中，后来才发现他们正在谈论私人事件”
摒弃(Dismissal)	暗示或挑战自我的方面，但应当被当作支持或反对自我方面的证据而被摒弃。 “通常情况下，我对我的研究非常认真，但是上一周我在测验前出去喝酒了，我没有研究。我的压力太大了，并且现在也不是正常的我。”
引起改变的联系	
因果关系联系	事件引起自我观的变化 “我开始上瑜伽课，后来我更喜欢安静并且成为更专注的人。”
揭示联系	事件揭示了自我的先前不被承认的方面 “在我们死里逃生之后，我发现我在高度紧张情况下能保持惊人的冷静——以前我从来不知道。”
未知结果的挑战	事件被描述为对目前自我的一个挑战，但是在叙事中没提到解决这个挑战的方法。 “我道德水平是很高的，但是上周聚会时我喝多了，然后依然开车，使我和朋友处于危险中。”
并列联系	事件与自我相关的言论是并列的，但是事件和自我的关系是不清楚的。 一个小女孩在谈论醉酒驾车事件中说，“它可能改变我灵性的缺乏”，然后转到与她妈妈谈论的她的大学计划。灵性缺乏和醉驾事件的关系是不清楚的。

McLean 和 Fournier (2008)从自我方面入手，又将自我-事件联系分为特质联系、价值观联系、观点联系以及个人发展联系四种类型。特质联系指稳定的行为特质，它涉及个体从特质方面理解自己。价值观联系关注于道德和信仰、对与错。观点联系关注个体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个人成长联系涉及成熟、自信的发展、力量或个人发展的其他方面。McLean 和 Fournier 试着理解这些联系的不同类型是如何与人生故事的建构融为一体的，并从认知努力和情感评估两个方面对其加工进行了解释。认知努力是指反思、思考、联系的过程，认知努力的水平越高表明个体越多的通过考虑或反思事件来制造联系，低水平的认知努力表明没有反思或叙述中提到了反思，但反思程度不高。情感评估是指积极成长的评估。高分属于积极的情感评估，低分则是消极的情感评估(5=高度积极成果，1=高度消极成果)。结果表明，认知努力和情感评估随联系类型的不同而异。制造特质联系的能力随着认知努力和情感评估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制造价值观联系的可能性随着评估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认知努力的效应却不显著；制造观点联系的可能性随着认知努力的提高而提高，而情感评估的效应不显著；制造个人发展联系的可能性随着认知努力和情感评估水平的提高

而提高。表 2 概述了这 4 种联系类型所对应的认知努力和情感评估的水平。

表 2 认知努力与情感评估与联系类型的关系

	认知努力高	认知努力低
情感评估高	个人发展联系	价值观联系
情感评估低	观点联系	特质联系

3.2 事件-事件联系

比自我-事件联系更高一级的自传体推理是事件-事件联系。事件-事件联系要求个体从个人生活更广阔的视角对事件间的联系进行推理(Habermas & Bluck, 2000)。这些联系关注一个事件是如何在引起另一个或几个事件间共有同一个主题的，或者事件是如何分享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有时我会因为意外事件责备他人，我因儿子的意外事故责备丈夫……，最终，我们离婚了”(事件是儿子的事故和与丈夫离婚)。

McLean (2008)研究表明，个体在报告事件-事件联系的数量上存在年龄差异。年轻人比老年人制造的事件-事件联系更少。事件-事件联系上出现的年龄差异可能与两个原因有关：(1)联想机制。老年人的联想机制要好于年轻人。在进行推理时，老年人更多的将一个事件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建

构人生故事。(2)年轻人的推理更多是理解自己或解决一个确定问题,而老年人的推理更多的用于整合他们的生活。

3.3 主题一致性联系

主题一致性指在叙事中创造共同主题的推理,以及建立人生故事间相似主题的推理。它是在对以前独立思考的诸多事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理解或建构一个更大的,更加完整的故事,而不仅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这种整合在人的一生中都会持续进行(McLean, 2008)。McLean (2008)认为主题一致性联系是最高级别的自传体推理类型。完整的生活故事需要围绕某个鲜明的重点展开,而主题将这个重点及其意义清晰的展示出来。一个联系性主题的出现意味着个体已经从总体上反思了生活,并形成了完整的人生故事。

主题一致性的形成有多种形式,可以把一个事件和其他事件联系起来(事件-事件联系),表明一个事件与其他事件相似,或者是提供一个有关个人生活的详细的表征,诸如“生活是艰辛的”、“我一直是幸运的”、“人是不可信的”、“家庭是最重要的”等(Habermas & Bluck, 2000)。主题一致性的建构包括核心主题、情境主题和概括主题三个层次,整合的具体故事类别和故事数量越多,主题一致性的水平就越高。核心主题是指一个单一话语的陈述式表达,是主题一致性的最低层次。情境主题是由几个相关的核心主题整合成的情境表达式或意义表达式,概括主题则是由若干个情境主题整合而成,来反映或表达问题的实质。主题一致性给个体的生活提供了方向感和自我感知,并且也使自己的故事能够让他人理解。

研究表明,认知努力不但影响自我-事件联系的水平,在主题一致性联系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主题一致性联系高的个体认知努力分数上也获得了更高的分数。(McLean & Fournier, 2008)。人格方面,主题一致性联系与自我发展的水平、宜人性和责任心水平呈正相关。此外,在年龄方面,老年人比年轻人的主题一致性程度更高(McLean, 2008)。

个体对主题进行整合的水平依赖于概括多场景故事的能力、解释故事的能力、以及在自传体记忆和推理中使用推理加工意识的发展(Habermas & Bluck, 2000),这三方面是到青春期才明显发展起来的。

首先,概括多场景故事的能力在青春期表现

出了增长的趋势。一系列根据图片叙述故事的研究表明,3~7岁儿童不能叙述出故事,13%的9~11岁儿童能够概括图片中的故事,50%的成人能够自发地建立说明故事全部目标的概括性陈述(Berman, 1988)。当要求概括多个故事时,结果更清晰地表明总结概括故事的能力到了青春期才开始发展。例如要求儿童为“Jimmy 想要一个自行车——Jimmy 想要钱——Jimmy 想要一个新的约定”这三个子场景选择三个题目的研究中,8岁的儿童不能区分这三个主题。11,14,18岁的青少年更倾向于获得自行车这个终极目标,25%的10岁儿童和75%的14岁少年,能够提供两个复杂传记故事的主要主题的充分陈述(Williams, 1993)。Adams (1991)的研究也为青春期概括主题能力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证据,研究中要求青少年概括一个传记叙事,结果表明,16到19岁的青少年比12到15岁的青少年提供了更多关于主题的陈述。

其次,解释文本的自发趋势在青春期时得到发展,但比概括虚构故事情节的能力发展得晚。当被问到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歡某个故事时,9岁的儿童不能提供关于故事要点的解释,而20%的13岁青少年和80%的17岁青少年能够提供有关故事要点的解释(Applebee, 1978)。其他研究发现故事的比喻性解释在青春期后期的青少年的报告中更频繁(Adams, 1991)。上述研究报告了解释故事的行为水平,结果表明解释故事的能力比概括故事情节的能力发展的晚,解释故事的自发趋势在青春期中期出现,并且在成年早期持续发展。然而这个结论也非定论,解释故事的能力也可能更早的获得。个体在解释和重新解释他的生活故事时依赖于个体对过去经历的意义和对真相的理解。

最后,个体对主题进行整合的水平依赖于推理加工的意识的发展。心理活动的推理方面的意识在8岁左右出现,当儿童从无效的演绎推理中区分出有效的推理时,如对一个隐藏的玩具做出玩具仍然存在的猜测性判断时,意识到不同的人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理解模糊的环境时,推理的意识就出现了。有证据表明,更复杂的关于认识论的推理在青春期中期开始出现,并且一直发展到成年早期(Boyes & Chandler, 1992)。青春期中期的认识推理从天真现实主义发展到怀疑主义,即使是到青春后期达到认识论水平的个体都很少。

总之,自传体推理的类型按数量和复杂水平由低到高包括自我-事件联系、事件-事件联系以及主题一致性三类。目前在不同推理类型的研究上明显不均衡,对处于自传体推理初级阶段自我-事件联系的研究较多,不但在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上对其进行亚类型的划分,还揭示了每种亚类型内在认知加工成分。对主题一致性联系的结构和相关的认知与人格等因素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结论。但对事件-事件联系的各方面的研究都明显不足,是否是由于事件-事件联系是一种处于中间的过渡阶段的自传体推理形式而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因此,深入的剖析这种自传体推理类型的结构和过程特点,及其与前后两种推理形式的联系,有助于认识自传体推理的整体状态和实质。

4 影响自传体推理的因素

哪些因素对自传体推理有影响,一直是人们试图回答的焦点问题。研究者试图从实证角度寻找影响自传体推理的证据。从研究者所选取的变量来看,可以分为个体内因素和环境因素。

4.1 个体内因素

个体内因素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一类变量。研究发现,个体的性别,年龄以及人格因素等会对个体的自传体推理产生影响。

自传体推理存在性别差异(McLean, 2008; Pasupathi & Mansour, 2006)。研究表明,女性可能在叙事的自传体推理上占有优势(McLean, 2008)。具体表现为,女性比男性报告的主题一致性更高,女性倾向于制造更多的联系,在他们叙述的联系中比男性包含更多与变化有关的内容,关于稳定性的联系更少。自传体推理中的这些性别差异可能源于童年时期叙事技能的发展。有研究表明,在对有关过去的谈话中,父母更倾向于同女儿讨论情感问题,尤其是忧伤情绪,并且也更倾向于向女儿详细的讲述情绪状态。这些在自传体记忆中父母-孩子谈话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成年人性别差异上,以至女性比男性报告更多的关于人格方面的表述,并且女性的叙事也更长。

年龄是影响自传体推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自传体推理到青年前期才开始发展,并在青春期持续发展直到最终成熟(Habermas, 2010)。建构单一情境简单故事的能力在18个月到3岁之间出现,尽管儿童建构故事的复杂性和精巧程度随着年龄

增长而提高,但仍然是很粗略的(Reese & Brown, 2000)。到了4到12岁儿童制造具有稳定结构的虚构故事的技能越来越熟练(Reid, 1999; Ukrainetz et al., 2005)。然而,仅在青春期,青少年才学会以传记形式构想个人经历,将人格置于个体发展的背景中并且以日益复杂的方式弥补个体的不连续性(Chandler, Lalonde, Sokol, & Hallett, 2003)。青春期是自传体推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整个青春期,人生故事的一致性随着青少年制造其历史表征的不断完整而提高(Habermas & Paha, 2001; Habermas & de Silveira, 2008)。这可能是由于青春期的社会技能和认知技能的发展包括理解个人自己和他人的经历,采纳他人观点和整合多种观点的能力,以及建构一个整合多个个人经历的更首要的生活叙事的日益提高(Habermas & de Silveira, 2008; Reese, Yan, Jack & Hayne, 2010)。研究证明自传体推理在成年阶段仍存在发展。Pasupathi 和 Mansour (2006)发现成年期自我-事件联系的数量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在成年中期剧烈的增加(Bluck & Glück, 2004)。McLean (2005)和 Habermas 等人(2008)研究表明普遍的自我-事件联系在美国和德国样本中从童年晚期到青春期也在增加。Bauer, McAdams 和 Sakaeda (2005)在一个小样本研究中发现老年人更喜欢叙述重要时期和过渡时期的成长以及一体化主题的生活经历,老年人在故事讲述能力中表现出更高的选择性。总体上看年龄与自传体推理存在非线性关系。青春期是个体自传体推理发展的重要时期,可能在以后的成人阶段都在发展。

除了性别与年龄,人格是影响自传体推理能力的另一个个体因素。McLean 和 Fournier (2008)调查了个体在自传体推理时报告的努力程度,以及这些个体的责任心特质,结果表明,努力程度与责任心特质同自我发展相关,说明某些人格特质可能会促进个体进行自传体推理加工。McAdams 等人也发现自传体推理的复杂性与个体人格的开放性有关(McAdams et al., 2004)。并且他们也发现外向性与叙事中积极的情感效价存在正相关,神经质与自传体推理的消极的情感效价有关(McAdams, 2006)。另外,自传体推理还与个体的明智程度有关,尤其是在个体对特殊的困难事件进行推理时,如犯罪事件(Bluck & Glück, 2004)。

4.2 环境因素

除了性别、年龄、人格等内部因素对自传体推理有影响外，环境因素也会对自传体推理产生影响，研究者主要关注两个影响自传体推理的环境因素：听众和文化。

听众的注意对叙述者的自传体推理能力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对正处于自传体推理能力发展时期的叙述者的影响更大。专注倾听并积极响应的听众，能够对叙述者的讲述提出问题，帮助叙述者讲述故事，由此促进叙述者自传体推理能力的发展以及人生故事的形成。对于自传体推理的发展来说，响应听众的注意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表明，响应的父母通常是把注意和支持以及同意结合在一起，来对儿童在事件中的独特表现进行反应，这样做有助于帮助儿童建构他们的记忆(Cleveland & Reese, 2005)。在儿童和成人的自传体推理能力发展的研究中，叙述者普遍认为响应的听众是令他们愉快的，并且如果叙述者和听众就叙述者建立的自我-事件联系达成一致时，叙述者对这些联系的记忆会更加深刻(Pasupathi & Hoyt, 2010)。父母作为最直接的响应听众，对儿童、青少年自传体推理能力发展有很大影响。

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发现，一些文化似乎比另一些文化要求更多的人生故事和自传体推理的讲述(Tonkin, 1992)。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经历的记忆和个人观点的详细阐述，至少是单个经历的详述(Wang, 2004)。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叙事的具体性上也存在差异。美国儿童或成人在自传体推理叙事中的具体性上的得分高于亚洲被试，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差异趋势也越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美国人的自传体叙事中包含更多特定时间点的事件，而亚洲人的自传体叙事中包含更多的日常事件。美国儿童更愿意谈论细节和特殊经验，而亚洲儿童则更喜欢谈论普遍经验而忽略细节。因此，由于这些历史和文化差异，人生故事也会随着文化而改变(Habermas, 2010; Bohn, 2011)。

5 自传体推理的脑神经机制研究

尽管自传体记忆的脑神经机制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专门针对自传体推理加工的脑区的研究还很有限。自传体推理在结构上与自传体记忆具有密切的关系，自传体回忆和自传体推理共同构成了自传体记忆。自传体回忆(Autobiographical

remembering)主要是提取自我概念记忆的具体内容，是个体在心理上重新体验过去发生的事件。自传体推理则是个体对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回忆，它更多的涉及事件和自我间的联系(D'Argembeau et al., 2014)。研究表明，人们在进行自传体推理时激活了自传体记忆网络中的一组特定的脑区。这些脑区可能调节关于自我和个人生活的概念性知识的提取、处理和整合，目的是获得关于过去经历的意义和价值。这些脑区在叙事的建构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有助于维持一致和稳定的自我感知和同一性感知。

D'Argembeau 等人(2014)将自传体记忆的提取方式分为自传体回忆和自传体推理，通过fMRI发现自传体回忆和自传体推理激活了大脑不同的脑区，与自传体回忆相比，自传体推理更多的激活了大脑的左侧网络，包括内侧前额皮质、额下回、颞中回和角回，这些脑区是语义加工脑区的一部分。腹内侧前额皮质可能行使着把价值或意义分配到与自我相关的信息上的功能，并且也对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信息产生情感意义。腹内侧前额皮质在进行自传体推理时产生的价值信号可能在个人叙事中过去经历整合的决定中以及在塑造这些经历对个人特质、目标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中起到一定作用。这个区域在个体参加自传体推理加工时的激活并不一致，个体在自我反思上的个体差异调节了激活的不一致，即自我反思水平高的个体在进行自传体推理时腹内侧前额皮质激活水平更高。这也进一步的证明了自传体推理和个人叙事的建构不仅仅是回忆，因为它们需要获取意义并评估过去经历。背内侧前额皮质与社会认知有关，同时也在反省加工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当任务中包含思考其他个体时背内侧前额皮质被更多的激活(Van Overwalle, 2009)。

可以看出，尽管对自传体推理的脑神经机制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明确地提示自传体推理有其独特的脑神经机制，且对其有了初步的了解。相信随着方法的进步和研究的丰富，对自传体推理的脑神经机制的认识会随着更多和更具科学性成果的涌现而不断深入。

6 自传体推理的应用研究

研究者通常将自传体推理的能力看作是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预测因素，他们运用叙述者自传

体推理的数量、类型、复杂性以及主题一致性程度对叙述者同一性发展进行评估,探索自传体推理与幸福感以及自传体推理与心理健康发展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更好的预测以及监控青少年的身心成长。

研究者对自传体推理的发展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Lilgendahl 和 McAdams (2011)发现,中年人的一生故事叙述中不同的加工主题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有关。在其研究中,尽管是在控制过去事件的平均效应后,对过去事件的积极加工与神经质依然呈现负相关,积极加工预测了高幸福感,自传体推理模式预测幸福感的程度要超过特质的影响和人口统计学因素。这些结果表明积极方式的自传体推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

个体对事件的自传体推理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有关。对于青年人来说,在对消极经历或消极事件的叙述中,自传体推理制造更多的自我-事件联系,获得更深刻的自我的见解与心理症状水平有高相关。一些年轻人更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推理自我。他们把经历中的低谷作为生活叙事和人生故事以及同一性发展的中心,这使他们心理健康水平更低。不过那些在叙述类似经历时,以积极的方式推理自我的年轻人,则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Banks & Salmon, 2013)。Dunlop 和 Tracy (2013)对酗酒成瘾者的自传体推理研究得出,那些在饮酒叙事中表现出更积极的自我变化的被试比其他饮酒者具有更高的自尊、自豪感以及心理健康水平。也就是说,以积极的方式对消极经历或消极事件进行自传体推理,对心理健康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在积极经历或积极事件的叙述中,自传体推理的数量和复杂性与心理健康的提高或降低无关,甚至是把这些经历和积极的或消极的自我气质联系起来时也无相关。这表明,从积极事件中得出的意义对于心理健康来说远不如从消极事件中得出的意义重要。

7 研究前景

关于自传体推理的研究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虽然已经获得丰富的成果,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本土化、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几个方面。

研究的本土化是今后该领域需要关注的方面。目前关于自传体推理的研究结论基本都是在西方文化视野下得到的。前期的许多研究已证实,西方人倾向于把自我看作独立于他人甚至重要他人,东亚人倾向于把自我看作包含重要他人或所属群体(杨帅,黄希庭,王晓刚,尹天子,2012);中国人的“自己人”和“他人”群体参照在记忆中的作用不同(杨红升,黄希庭,2007),进而不同的他人与自我关系的解释意义也应是不同的。如前所述作为自我反思性加工的自传体推理,受文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已有表现,如东西方人在叙事内容、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对中国文化背景下自传体推理的过程、结构与内容的探究明显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未来应给予深入的探究的问题。

研究方法上,当前的研究主要以访谈法为主,认知实验研究并不多见。应用现代认知实验一方面可以改善访谈法在研究效度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可以把自传体推理加工与个体的内部生理机制结合起来,进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探讨自传体推理的认知过程和生理机制。例如,关于自传体推理能力在年龄和性别上差异的研究并没有获得认知神经科学层面的证据。由此可见,自传体推理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研究内容上,从自传体推理的影响因素角度来看,目前对自传体推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围绕的是如年龄、性别、人格之类的个体内因素和听众和文化等少数个体外因素。除此之外,有研究预测个体的内部资源以及个体的经历也对自传体推理有影响(McLean & Mansfield, 2011),但并没有实证研究表明内部资源和经历如何对自传体推理产生影响。此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各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如哪些起调节或中介作用,以及这些因素间更完整的结构模型等都可以成为下一阶段研究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 郭金山,车文博.(2004).自我同一性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心理科学*, 27(5), 1266-1267.
- 杨红升,黄希庭.(2007).中国人的群体参照记忆效应. *心理学报*, 39(2), 235-241.
- 杨帅,黄希庭,王晓刚,尹天子.(2012).文化影响自我解释的神经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1), 149-157.
- Adams, C. (1991). Qualitative age differences in memory for

- text: A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Psychology and Aging*, 3, 323–336.
- Applebee, A. N. (1978). *The child's concept of 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nks, M. V., & Salmon, K. (2013). Reasoning about the self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way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young adulthood. *Memory*, 21(1), 10–26.
- Bauer, J. J., McAdams, D. P., & Sakaeda, A. R. (2005). Interpreting the good life: Growth memories in the lives of mature, happy peo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203–216.
- Berman, R. A. (1988). On the ability to relate event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Processes*, 11, 469–497.
- Berna, F., Bennouna-Greene, M., Potheegadoo, J., Verry, P., Conway, M. A., & Danion, J. M. (2011). Impaired ability to give a meaning to personally significant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 703–711.
- Berzonsky, M. D. (1994). Self-ident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ss and cont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8(4), 453–460.
- Bluck, S., & Habermas, T. (2000). The life story schema.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4, 121–147.
- Bluck, S., & Glück, J. (2004). Making things better and learning a lesson: Experiencing wisdom across the lifesp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 543–572.
- Bluck, S., & Alea, N. (2008). Remembering being me: The self continuity func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In F. Sani (Ed.), *Self continuity: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erspectives* (pp. 55–70).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Bohn, A. (2011). Normative ideas of life and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in life narrative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1, 19–30.
- Boyes, M. C., Chandler, M. (1992). Cognitive development, epistemic doub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1(3), 277–304.
- Chandler, M. J., Lalonde, C. E., Sokol, B. W., & Hallett, D. (2003). Personal persistence,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suicide: A study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North American adolescent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8, 1–138.
- Cleveland, E. S., & Reese, E. (2005). Maternal structure and autonomy support in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past: Contributions to children'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 376–388.
- D'Argembeau, A., Cassol, H., Phillips, C., Baetueu, E., Salmon, E., & van der Linden, M. (2014). Brains creating stories of selves: The neural basis of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 646–652.
- Dunlop, W. L., & Tracy, J. L. (2013). The autobiography of addiction: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bstinent alcoholics. *Memory*, 21(1), 64–78.
- Erikson, E. H. (1956). 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1), 56–121.
- Fivush, R., Bohanek, J. G., & Zaman, W. (2011). Person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narratives in relation to adolescents' well-being.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1, 45–57.
- Grotevant, H. D., & Carlson, C. I. (1987). Family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s: A descriptive review. *Family Process*, 26(1), 49–74.
- Habermas, T., (2010).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Arguing and narrating from a biographical Perspectiv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31, 1–17.
- Habermas, T., & Bluck, S. (2000). Getting a life: The emergence of the life story in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748–769.
- Habermas, T., & de Silveira, C.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oherence in life narratives across adolescence: Temporal, causal, and thematic aspec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4, 707–721.
- Habermas, T., & Köber, C. (2014).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in life narratives buffers the effect of biographical disruptions on the sense of self-continuity. *Memory*, 1–11.
- Habermas, T., & Paha, C. (2001). The development of coherence in adolescents' life narratives. *Narrative Inquiry*, 11(1), 35–54.
- Krettenauer, T., & Mosleh, M. (2013). Remembering your (Im)moral past: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and moral identity development. *Ident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and Research*, 13(2), 140–158.
- Lilgendahl, J. P., & McAdams, D. P. (2011). Constructing stories of self-growth: How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atterns of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relate to well-being in mid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9, 391–428.
- McAdams, D. P. (1993). *The stories we live by: Personal myth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lf*. New York: Morrow.
- McAdams, D. P., Anyidoho, N. A., Brown, C., Huang, Y. T., Kaplan, B., & Machado, M. A. (2004). Traits and stories: Links between dispositional and narrative feature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 761–784.
- McAdams, D. P. (2006). The redemptive self: Generativity and the stories Americans live by.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3(2–3), 81–100.
- McLean, K. C. (2005). Late adolescent identity development: Narrative meaning making and memory telling. *Development Psychology*, 41, 683–691.
- McLean, K. C., Pasupathi, M., Pals, J. L. (2007). Selves creating stories creating Selves: A process model of self-

- develop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3), 262–278.
- McLean, K. C. (2008). Stories of the young and the old: Personal continuity and narrative ident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4, 254–264.
- McLean, K. C., & Fournier, M. A. (2008). The content and processes of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in narrative ident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 527–545.
- McLean, K. C., & Mansfield, C. D. (2011). To reason or not to reason: Is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always beneficial?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1, 85–97.
- Pasupathi, M., & Mansour, E. (2006). Adult age differences in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in narrat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 798–808.
- Pasupathi, M., & Mansour, E., Brubaker, J. R. (2007). Developing a life story: Constructing relations between self and experience in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Human Development*, 50(2-3), 85–101.
- Pasupathi, M., & Hoyt, T. (2010). Silence and the shaping of memory: How distracted listeners affect speakers' subsequent recall of a computer game experience. *Memory*, 18, 159–169.
- Pasupathi, M., & Weeks, T. L. (2011). Integrating self and experience in narrative as a route to adolescent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1, 31–43.
- Reese, E., & Brown, N. (2000). Reminiscing and recounting in the preschool year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4, 1–17.
- Reese, E., Yan, C., Jack, F., & Hayne, H. (2010). Emerging identities: Narrative and self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early adolescence. In K. McLean & M. Pasupathi (Eds.), *Narrative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 Creating the storied self* (pp. 23–43). New York: Springer.
- Reid, D. F. (1999). *The acquisition of narrative syntax*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 Ricoeur, P. (1983).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K. McLaughlin & D. Pellauer, Tra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rbin, T. R. (Ed.). (1986).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NY: Praeger.
- Ukrainetz, T. A., Justice, J. M., Kaderavek, J. N., Eisenberg, S. L., Gillam, R. B., & Harm, H. M.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expressive elaboration in fictional narratives.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48, 1363–1377.
- Van Overwalle, F., Van den Eede, S., Baetens, K., Vandekerckhove, M. (2009). Trait inferences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 ERP timing and localization under spontaneous and intentional processing.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4(2), 177–190.
- Wang, Q. (2004).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elf-construct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self-description in European American and Chinese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0, 3–15.
- Weston, D., & Heim, A. K. (2003). Disturbances of self and identity in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M. R. Leary & J. P. Tangney (Eds.),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pp. 643–66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Williams, J. P. (1993). Comprehension of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learning disabilities: Identification of narrative themes and idiosyncratic text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5, 631–642.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The Thought Process of Self Identity Formation

LIN Jiabin; LI Lih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is a reasoning that connecting events and self, it creates the continuity of human's life story, it is one of the core proces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lf-identity. It combines self-concept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develops and protects personal continuity and self-identity perception.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types of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and analyzes the components that have influence on it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is review introduces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autographical reasoning and studies that in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graphical reasoning and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etc.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gives some main idea about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research.

Key words: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narrative; life story; self-event connections.